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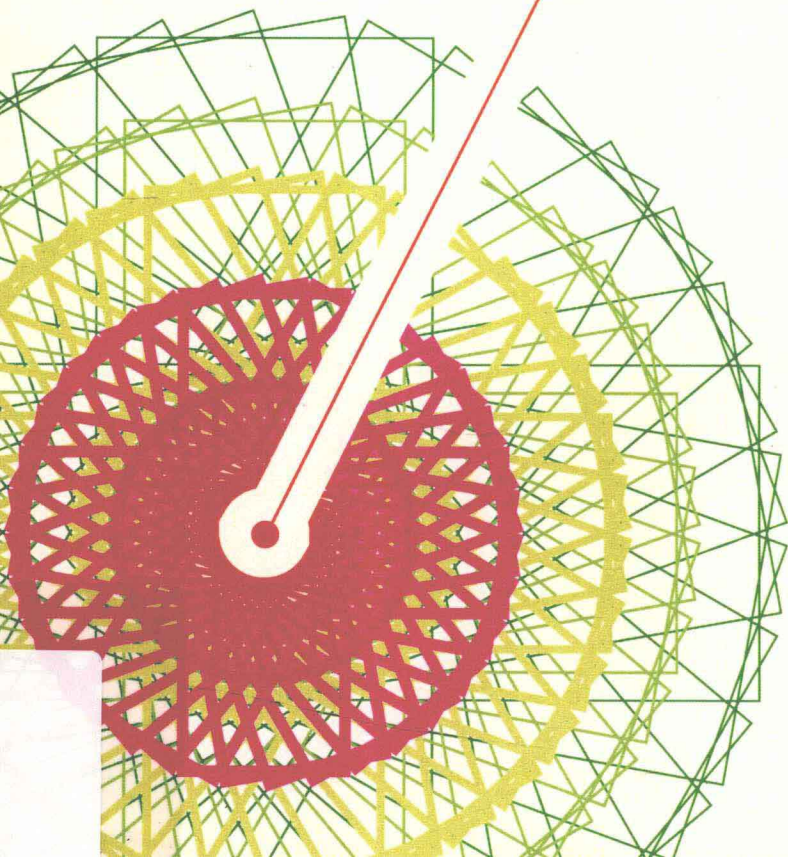
文化 圈層論

董大中／著

【人類】系列之一

Concentric Circles of Culture

反思
超越中西文化之碰撞與融合
關注全人類發展的最新力作



文化

圈層論

董大中／著

【人類】系列之一

文化圈層論

作 者 / 董大中

責任編輯 / 鄭伊庭

圖文排版 / 郭雅雯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 年 9 月 BOD 一版

定價：32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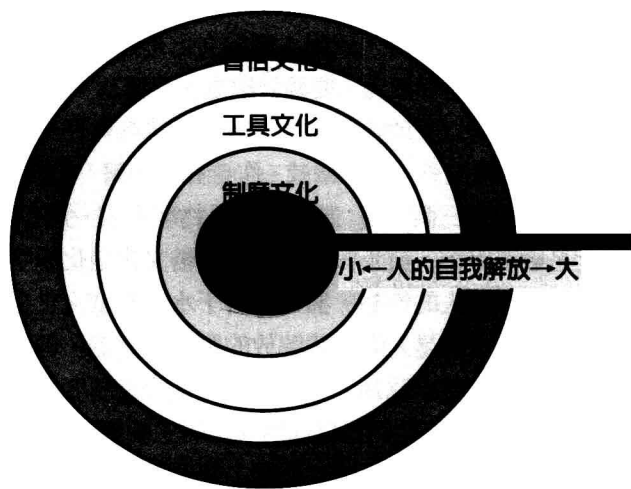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提要

本書屬文化哲學。過去的文化學著作，大都以語言、神話、宗教、藝術、科學等為對象。本書把所有文化現象收在筆底，然後按其功用和特點分成三類，稱為制度文化、工具文化和習俗文化；一般所說語言、神話、宗教、藝術、科學等，本書稱為工具文化。書中說：制度文化約束人，把人規則化；工具文化教育人、提高人、解放人，把人「文化」化；習俗文化顯示人，團結人，把人族群化、符號化、慣性化。制度文化是戴在脖子的項圈，它時刻提醒你，按照一定的規矩辦；工具文化是別在口袋裡的鋼筆，它既表明你有文化，你也隨時可以把它拿出來，寫出你的心得、感想；習俗文化是插在胸前的徽章，人們一看見，就知道你是哪裡人，要幹什麼去。可稱為「三種文化論」。稱「圈層論」者，指以人的自我解放為軸心，按各自作用的大小，做成一個同心圓，由裡向外，作用遞減。作者據卡西爾「符號宇宙」之說，把三種文化概括為三個宇宙：制度文化是物理宇宙，引起物理性變化；工具文化是數學宇宙，發生數學變化；習俗文化是化學宇宙，它以化學變化的方式塑造人的性格，猶如鹽溶於水。制度文化是人的自我解放的對象，工具文化是人的自我解放的動力和武器，習俗文化是人的自我解放的表現。書中認為，容易發生變化的是制度文化，而另兩種文化是穩固而持久的，他們也是民族文化的主要構成成分。這樣區分，突出了制度文化的重要性，主次分明，條理清楚。書中大部分觀點屬作者獨創，而所依據或引述的他人觀點，書中都有明確交代。本書不針對某個國家或民族，是就全人類文化立論的。全書分三個部分，共七章。第一部分是緒論，提出問題，也就是寫這本書的緣起，從中國

事實出發，其實是對中國百年來中西文化大論戰的總清算。第二部分是本論，共五章。第二章以《共產黨宣言》中的話，論述了為什麼以人的自我解放為軸心的問題。接著對三種文化分別做了論述，包括各自的構成及特點，以及該種文化跟人的關係。第六章是總起來說，並回答了第一章提出的問題。最後一章是附論，以以上觀點看待當前的世界。作者對亨廷頓「文明的衝突」陳述了不同看法，認為二十一世紀是政治整合的世紀。



自序

多年來我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現在拿出這麼一本書，可能會使一些朋友覺得奇怪。但既然每個人都是文化的主體，而文化又「經濟、政治乃至一切無所不包」（梁漱溟語），在這方面說一些個人的想法，最自然不過。這本書正是我思考文化問題的一本試卷。

我立意寫這本小冊子，是在十年以前。起因是在清末以來的中西文化論戰中人們對「文化」一詞的用法和闡釋很不相同，有時相差甚遠。為了對中西文化論戰問題有更深切具體的感受，我對李敖做了專題研究。在一九六二年臺灣中西文化大論戰中，李敖作為一方大將，發表了許多文字，對方發表的文字更多，雙方論爭的激烈程度是空前的。那樣的大論戰，在五十年代以後的大陸不可能發生，這也就使這場大論戰成為中國中西文化論戰史上最近的一次，而具有特殊的意義。也就在李敖研究中，我對文化問題有了較多的思考，形成了現在這本小冊子的主旨和基本框架，隨即提出了「文化圈層論」這個理論。

不敢說有多大的價值。沒有接受過專門訓練，沒有系統讀過這方面的著作。好處是，它可以使我少受束縛，不理會已有學派、思潮的說辭，想到什麼說什麼。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自然，書中難免有常識性錯誤，可能會讓行家貽笑大方。有一點感到自信，就是不因襲他人。筆者追求的學術品德是發現，儘量多說一些從他人著作中看不到的話。我的信條是，為增長知識而讀，為解決問題而寫。三十年來，我搞完一個課題，就另搞一個，目的正在於此。寫完之後，自覺任務完成，拍一拍屁股，一走了之。不同的是，在這個礦區門口停留的時間長了些，而且短時間不會走開。

有兩點需要說明。其一，本書所說的文化，是最廣義的文化，不是像某些人說的限於精神層面的文化，那樣，有許多問題說不清楚。其二，本書所使用的術語，有時跟其他著作相同，其含義卻完全屬於本書，不能跟其他著作相類比。在文化人類學上，「文化圈」和「文化層」一類術語，時常可見。比如梁啟超就有「中國文化圈」之說。日本學者石川榮杏等人著《現代文化人類學》，詳細介紹了文化圈學說。本書「文化圈層」，既跟「文化圈」不同，亦跟「文化層」有異，切不可當作以上兩個術語的合稱。還有如「制度文化」等，本書也自有其獨特的含義。

不言而喻，這本小冊子不是針對某個國家或民族的，而是著眼於全人類。偶有說到某個國家時，只不過舉例而已。在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是不可阻擋的潮流，正席捲全球。日益發達的旅遊事業，更使不同膚色、不同地域的人們，成為交流、對話的夥伴。曾經被當作「愛國主義崇高行動」的「使用國貨」，在許多國家，變成了歷史。千百年各自獨立的文化，要繼續保持「獨立自主」，關門鎖國，已不可能。原來互不相識、互不聯繫的人們，從生活方式到價值觀念，正在靠近，趨同。生活在「歐盟」國家的人們，已有「天下一家」之感。中國古聖先賢提出的世界大同的理想，並不像一些人說的「烏托邦」，正在向我們招手。這就是當今的世界。這就是世界發展的總趨勢。筆者有關人類和人類未來的思考，並非只有這一本小冊子，以後還將寫下去。

我不知道它的命運如何，只求把我的思考記錄下來，不至於被洪水淹沒。即使被鎖在箱底，我的目的已達，任務已畢，於願已足。我感到欣慰的是，當這本小書還沒有動手寫作、僅僅在《董永新論》裏做了主旨概述並用本書的理論對「孝」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簡單評述，劉錫誠先生就在序文中說：「竊以為，老董的這個『文化圈層論』說的提出，其在我國相對滯後和薄弱的文化學上的意義，遠遠大於對董永故事的文化學個案的剖析。」正是劉錫誠兄的這

段話，鼓舞我把這本書寫了出來。掩卷深思，我該不會辜負老友的期望吧。

希望聽到海內外行家的批評。

2011年6月6日，三閒居

目次

自序	iii
第一章 中國百年中西文化大論戰回顧——問題的提出	1
晚清的變法圖存運動：大論戰的序幕	1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引發的討論	6
「全盤西化」論種種	16
從〈宣言〉到〈宣言〉	24
一九六二年臺灣中西文化大論戰	33
「文化圈層論」的形成過程	41
第二章 軸，或說核心：人的自我解放	49
文化：人的價值的物化	49
人的自我解放四部曲	60
在文化的光譜上	70
第三章 制度文化	73
制度文化、核心文化、第一種文化	73
文化的組織者和整合者	75

「變遷要素」、「物理宇宙」	80
制度文化是全人類的	89
個人與制度的興廢	96
制度與人	101
次制度及其特點	107
第四章 工具文化	115
工具文化的基本構成	116
工具文化的特點	139
工具文化與人	161
第五章 習俗文化	169
甲類習俗和乙類習俗	170
習俗文化與民族特色	194
習俗背後長長的歷史	201
習俗文化與人	211
第六章 比較與辨析	217
三種文化，作用各有不同	217
文化的強制性	221
文化的全人類性與普世價值	226
民族文化，文化與傳統	233

文化的延續、發展和變異.....	240
文化認同和對異文化的認識.....	247
功能的轉化.....	253
以我為主，積極吸取，保持民族特色.....	256
重說「全盤西化」及其他.....	261
第七章 當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和走向	275
從「文明的衝突」說起.....	275
專制主義是恐怖主義的土壤和溫床.....	283
二十一世紀是政治整合的世紀.....	287

第一章 中國百年中西文化大論戰回顧 ——問題的提出

晚清的變法圖存運動：大論戰的序幕

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既掀開了中國人屈辱的一頁，也打開了中國人接受新事物、新文化的大門。接著，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入北京等，一次又一次的賠款、割據，使封閉已久的「天朝」中國跟外國的聯繫一下子多了起來，也使中國從一個雖然封閉卻仍獨立自主的國家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痛定思痛，人們忽然覺得「泰西」各國有許多值得學習之處或利用之處，於是產生了研究介紹「西學」和運用「西學」的熱潮。

面對資本主義列強的欺侮，一部分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思考，如何才能保國保種，在現代化的槍林彈雨下生存下去。魏源是其中一人。魏「晚遭夷變，謂，籌夷事，必知夷情。復據史志及林則徐所譯《西夷四州志》，成《海國圖志》一百卷。」（《清史稿》）魏在該書中提出「欲制夷患，必籌夷情」（〈籌海篇〉）和「師夷長技以制夷」（〈敘〉）的方略，在另一文中說：「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魏源集》上冊第206頁）。跟魏源有同樣經歷（一同抵抗英帝國主義，又同遭失敗而退下來）的林則徐有相同的話：「師敵之長技以制敵。」（見《籌辦夷務始末》）這裡的「師夷」「師敵」，都含有承認自己不行的意思，要向人家學習。比林、魏二人更激進的龔自珍，在鴉片戰爭中已看到

時局的嚴峻，感到需要一場革命式的變革，不過他在一八四一年就逝世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在「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影響下，一些人開始發起組織了「同光新政」，即人們常說的「洋務運動」。這一運動以組建新式軍隊、從西方引進機器和技術、革新生產方式為主要內容。用李鴻章的話說，是：「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製器為先。」

促使中國人努力學習西方的，還有另一種動因。有人把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的大變動稱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歷史之長，使人想到夏商周三代。孔子有「克己復禮」之語，是「復」先代之「禮」，在孔子看來，以前的人們分等級，知尊卑，講仁義，遵王道，敬長愛幼，父慈子孝，道德面貌高尚，社會秩序良好，到他自己生活的時代，「禮崩樂壞」，不堪回首，所以要回到過去。在中西方有了交流之後，人們發現，當下的中國不僅國力衰微，技術落後，船不堅炮不利，而且在道德風尚上，也遠不如「夷人」。由於中國人所接觸的西方人大都是西方的高等人物，有紳士風度，講究禮節。在政治上，西方國家大都實行憲政，國家機器運轉有法可依，議會制度能充分發揚民意，不像中國，人民意志從來不受重視，宮廷鬥爭讓人慘不忍睹，加之當時慈禧大權獨攬，皇權旁落，人們敢怒不敢言，這自然加深了人們對西方一套政治制度的羨慕心理和移植要求。洋務運動的興辦，使歐美國家的新思想、新文化紛紛介紹進來，為立意改革的中國人提供了更多的思想資源。鄭觀應、王韜等人把眼光轉向國家的政治制度。鄭著有《盛世危言》，他在〈敘〉中說：「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育才於學校，議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用心……」王韜在〈重民〉中把一些歐美國家實行的君主立憲制稱作「君民共主」，要求在中國推廣，「君主於上，而民主於下」。兩人所說「上下」，連用語都是相同的。王韜多次說，西洋「以禮義為教」，「以仁義為基」，「以教化德澤為本」。郭嵩燾更有「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

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等論述。薛福成、譚嗣同等人也都有類似言論，他們所說「唐虞以前」「三代以前」如何等等，恰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最好注釋，也說明這一點幾乎成了當時所有變法圖強者的共識。

當時那股向西方學習的思潮，被稱作「中體西用」論。鄭觀應在前引「育才於學校」一段話後接著說：「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前者，他當作「體」者，從人們常說的中國傳統文化到他們所想要實行的立憲政治，後者，即他當作「用」者，限於技術層面。後由沈毓桂、張之洞概括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八字方針。它是把西方文化的碎片搭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軀體上，以補自己的不足。這意味著，學習西方文明，包括近代科學技術、工商制度、教育制度等，都只是一種手段，一種方法，而為我所用，並不是把它作為自己的骨肉，骨肉仍是中國的「聖教禮治」，是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東西。接著，康有為作《新學偽經考》，從學術角度思考問題，開始對兩千年來統治中國人民心靈的古代文化發生懷疑，他把「數十篇」古聖先賢之文稱為「偽經」。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殊不知此偽書者，千餘年來，舉國學子人人習之，七八歲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視為神聖不可侵犯。」他甚至說「其中一部分實糞土也」。這就有對「中學」的否定之意。

這時引進的西方文化，既有技術層面的東西，也有理論方面的東西，還有歐美一些國家的制度、風情，應該說是多方面的。出生於山西小官僚家庭的徐繼畲，到福建任職以後，眼界大開，寫了《瀛寰志略》一書，介紹他所聽說和從手繪地圖中看到的世界各國情形。書中對美國的民主政治極為讚賞。他說：「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其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第九卷）該書於一八四八年刊刻問世，以後多次翻刻，流傳極廣，並很快傳入日本。其影響遠超過魏源的《海國圖志》。作者「張眼看世界」的廣闊胸懷深

入人心。六十年代興起的洋務運動，跟這部書有很大關係。從維新派的心態上說，他們急於變法圖存是顯而易見的，但其主張又是雜亂無章的，也沒有一條共同認可的道路。當變法觸及「君臣關係」時，一些人往往顯得縮手縮腳。另外還有些人心靈上的「文化自我重心論」的陰魂不散，常常跑出來騷擾。

這一場「大變局」，可說是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中西文化相碰，這並不是第一次。十八世紀末葉，大英帝國為給乾隆皇帝祝壽，派出馬戛爾尼勳爵率領的龐大使團來華，就被法國著名學者、政治家阿蘭·佩雷菲特稱為「兩個世界的撞擊」，他在《停滯的帝國》一書裡做了詳盡的敘述和分析。陳獨秀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中把中西文化碰撞分為七期，說：「今茲之役，可謂為新舊思潮之大激戰。」又說：「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數百年來，吾國擾攘不安之象，其由此兩種文化相接觸相衝突者，蓋十居八九……」（《獨秀文存》第37、38頁）

以上所述，大致從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經過半個世紀。曾廉以「言技」、「言政」、「言教」把它概括為三個階段：「變夷之議，始於言技，繼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上杜先生書〉）五四運動前，陳獨秀用「學術」、「政治」、「倫理」三個詞概括其先後借鑒的重點。還有其他三階段論的。從縱向看，國人的認識還算步步深入，不斷推進。那以後，行動多於言論，像創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成立翻譯機構等都是。最大的動作，是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這場大變革最後失敗了，但改革的車輪並沒有因此停頓下來，反而在多方面展開。一九〇一年八月，廢除八股取士。九月，詔令各省設立學堂。隨即同文館併入京師大學堂。一九〇二年，由新任命的管學大臣擬定《欽定學堂章程》。這是中國第一次以法定形式公布的完整的學校章程，從蒙學（相當於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到大學院（相當於研究生院）都有了相應的規定。人們把這一章程稱為「壬寅學制」。「廢科舉、興學校」是在制度文化上的一次成功改革，它使流傳一千多年的科舉制被

徹底埋葬。法制上，從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六年）冬天起，就開設修律館，「擇西法之善者」（上諭中語），既改革舊的法律，又制定新的法律，包括《大清民事訴訟法》和《大清新刑律》在內。實行憲政，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成了一些改革派的主要訴求，像康、梁等人就積極主張君主立憲，清廷也不得不宣布「預備立憲」。

蔣夢麟在其回憶錄《西潮·新潮》中說：「……中國這時已經無可置疑地踏上西化之路了。日本對帝俄的勝利，更使中國的西化運動獲得新的鼓勵，這時聚集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已近五萬人，東京已經成為新知識的中心。國內方面，政府也已經開始一連串的革新運動，教育、軍事、警政都已根據日本的藍圖採取新制度。許多人相信：經過日本同化修正的西方制度和組織，要比純粹的西洋制度更能適合中國的國情，因此他們主張通過日本接受西洋文明。但是也有一般人認為：既然我們必須接受西洋文明，何不直接向西洋學習？」（第 65 頁）蔣夢麟這段話，比較真切地反映了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情況和人們的心態。這裡蔣夢麟用「西化運動」取代「維新運動」，含義自有不同。一九〇〇年爆發的「義和團運動」是「西化運動」的反動，一度造成社會的動亂，但它也未能阻止西化運動的深入發展。

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魏源、林則徐等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起，直到民國初年，就中國思想界說，雖然有人頑固堅守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對改革、對維新採取抵制和反對的立場，如曾廉就是反對戊戌變法的，還有「后黨」的一些追隨者，也成了扼殺變法維新的劊子手，但並沒有展開像樣的文化論爭。王國維在其《遺書》中說：「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觀堂別集》第四卷第 7 頁）這一長時期，可以說，把西方文化拿來為我所用，成為思想界的主流。這一時期也沒有「東方文化」「西方文化」之說。「西學」，這